



葛佩琦：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部门的中共党员

■文人轶事■

费孝通的文化箴言

1990年，费孝通迎来了他的80寿辰。各界贤达齐聚一堂，为这位学界泰斗贺寿。

宴会上气氛热烈，大家在对费孝通表达祝福之余，自然而然地谈到了他一生斐然的学术成就以及对社会的卓越贡献。有人提及当今世界文化的多元现状，还有不同文化交流碰撞时产生的诸多问题与挑战。

费孝通面带微笑，思绪飘回往昔。他回忆起在英国留学时，曾与同学利奇就人类学的治学理念展开的深刻探讨。利奇觉得人类学不过是智力的操练或游戏，可费孝通却坚定地认为，身为中国学者，不能仅仅将研究当作个人的自我实现。

他还回想起当初放弃医学转攻人类学的初心，那正是源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以致用”的使命感。在他心中，学术研究必须要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

说起文化，费孝通的眼神中更添神采。他提及在大瑶山考察的那段日子，与瑶族同胞共同生活的经历让他深切领悟到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真谛。费孝通解释说，“各美其美”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认定的美好，而在其他民族看来或许并非如此。但只要民族之间能尊重彼此的价值标准，那便是了不起的进步。他进一步阐述，当民族之间平等交流频繁，人们就会发现其他民族认为美的事物，自己也能欣赏，这便是“美人之美”，这是超脱自身生活方式的高境界。

紧接着，费孝通目光深邃，继续说道：“‘美人之美’再升华一步，就是‘美美与共’。当不同的标准相互融合，便达到了古人所向往的‘天下大同’。”

在场众人纷纷点头，深深为这番话语所触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字箴言简洁有力，深刻阐明了尊重文化多样性、自我认知、相互理解与包容的重要意义。

寿辰聚会结束后，费孝通的16字文化箴言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它成为了人们处理文化关系、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准则，也让更多人了对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和人文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敬意。

（据《人民政协报》）

沈尹默以曹雪芹为师

民国初年，沈尹默就以书法和旧体诗词而闻名遐迩。沈尹默曾经二度游学日本，归国后，他先后执教于北大、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同办《新青年》杂志，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而且，由于书法造诣极深，沈尹默与李志敏合称“北大书法史两巨匠”，徐平羽称赞沈尹默的书法艺术成就“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无愧”。

沈尹默熟读《红楼梦》中的诗词，并且烂熟于心，他常请人用手遮住《红楼梦》诗词的某一句中的一个字，然后由他说该用什么字来填，总是准确无误。

因为沈尹默的旧体诗词也写得非常好，因此当时有一个日本学者问他：“沈先生，是谁教您写诗的？”沈尹默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写诗不曾拜过老师，若说有，那就是曹雪芹了。”由此可见，沈尹默是多么喜欢《红楼梦》，多么崇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据《联谊报》）

叶圣陶题诗赞苏绣

苏绣起源于苏州，是一种装饰性与实用性兼备的工艺美术。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叶圣陶对这种家乡独特的民间艺术十分喜爱。他曾多次来到苏州刺绣研究所参观，每次来都由苏绣艺术家顾文霞陪同。

1962年1月18日，叶圣陶在顾文霞陪同下参观了研究所新创制的绣品。琳琅满目的绣品让叶圣陶目不暇接，他欣然挥毫，写下了“国艺之花”的题词。

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叶圣陶如此关心苏绣艺术，让顾文霞非常兴奋和感动。为了表达对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的敬重和谢意，顾文霞准备亲手绣制一幅绣品赠送给叶圣陶。她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绣了一幅《猫蝶图》。她以“猫蝶”为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猫蝶”的谐音是“耄耋”，含“高寿”的寓意，赠送《猫蝶图》，即向老人祝贺70岁寿诞。

叶圣陶收到这幅别致的寿礼，甚为喜爱。欣赏之余，他挥笔赋诗一首，并题曰：“顾文霞同志以所绣猫蝶图见赠，精妙非凡，受之欣然，题十四韵为酬。”全诗如下：

小猫仰蝴蝶，定睛侧微首；侧首何所思，良难猜之透。未必食指动，馋涎流出口；未必如庄生，蝶我皆乌有。猜之亦奚为，但赏针法秀。小品状二物，恍睹春晴昼；制作者谁欤，文霞传顾绣。投邮远见赠，受之感意厚。文霞擅此艺，勤习始自幼；功到二兼，灵心妙手巧。往常涉重洋，神技众咸惊；观者咸惊叹，丝纶倾刻就。声誉驰异域，荣光宁独受。精进愿无涯，以为文霞寿。

“文革”结束后，顾文霞很想重绣《猫蝶图》，将叶圣陶所作的首首十四诗韵也加绣其上，使之成为相得益彰的艺术品。遗憾的是，这首诗散失不知去处。

1983年，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到苏绣研究所参观时，顾文霞特别提起这件事。叶至善说：“父亲这首诗，家里应该还能找到，我回去后寻出来马上寄给你。”不久，她欣喜地收到叶至善从北京寄来的附有叶圣陶十四诗韵的信函。于是，一幅加绣有叶圣陶十四诗韵的绝妙绣品《猫蝶图》在顾文霞的一双巧手中诞生，由此艺坛也留下了一段“猫蝶诗韵”的佳话。（据《人民政协报》）

1984年6月，葛佩琦的老战友和入党介绍人刘子久赋诗一首：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这四句诗，概括了葛佩琦的经历与性格。

葛佩琦的一生，舍生忘死、光明磊落。他多次受党的指派，不计个人安危，长期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从事地下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襟怀坦荡，坚信真理，以崭新的姿态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爱国青年学运先锋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仁兆镇潮泥沟村。这是一个八口贫寒之家，父母膝下育有弟兄五人和一个妹妹，仅靠三亩半地维持生活。葛佩琦自幼聪慧好学，放牛放猪之时也手不释卷，埋头苦读。

1929年春节后，葛佩琦用一条小竹扁担挑起行李和书籍，背井离乡，考取了黄县崇实中学。1930年5月，同学们发起纪念济南“五三”惨案两周年大会，但是活动中“向国旗鞠躬”的行动遭到校长的反对。全体同学爱国情绪高涨，坚决冲破阻挠，毅然向国旗行了三鞠躬礼。校长翌日就宣布学校停止上课，予以解散。

葛佩琦并没有因此放弃求学，而是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决定到更远的北平去读书。

到了北平，葛佩琦举目无亲，凭着顽强的毅力，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他经人介绍，在工厂的汽车房里当学徒，每天两顿窝窝头，每月1元零花钱，没有工资。1930年9月，葛佩琦在老同学的资助下，插班进入私立崇实中学初中三年级。为了筹措学费和生活费，他到校长开办的羊奶厂做送奶工。羊奶厂负责给他交学费，每月另发工资3元。工作之余，他争分夺秒刻苦学习，用两年的时间就读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于1933年暑假假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此后两年，他或当家庭教师，或到中学教课，依旧勤工俭学，发奋苦读。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内妥协退让，对内镇压革命。中国共产党则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动全国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两相对比，葛佩琦深刻认识到必须积极向共产党靠拢，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葛佩琦感到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便参与发起了北京大学学生会。

1935年12月9日，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葛佩琦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举行演讲，展开抗日救亡大宣传。1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正式成立，葛佩琦当选为执行委员。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2月16日凌晨，国民党武装军警包围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大肆抓捕爱国学生。站在游行队伍最前排的葛佩琦首当其冲，被抓进警察署“过堂”。面对强加给学生的“造反”罪名，葛佩琦义愤填膺地说：“是！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当对方要他跪下时，他怒斥道：“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堂堂大学生，是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几天之后，关押在监房里的北大学生，由学校当局保释回校。经过这次狱中斗争，葛佩琦更加坚信，要抗日救国，就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36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和学联指导平津学生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冒着凛冽的寒风，向民众传播抗日救亡的火种。宣传团回到北平后，于2月1日召开全体团员大会，宣布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葛佩琦成为民先队的第一批队员。

3月底，北京大学学生会被勒令“停止一切活动”。6月初，学生们发起成立“北京

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葛佩琦当选为21名委员之一。在民先队的大力支持和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下，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12月11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葛佩琦当选为副主席。

1937年6月，葛佩琦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他没有去中学教物理，而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日斗争。北平各大院校的学生在西山联合举办军事夏令营，葛佩琦专程去听课，学到一点游击战常识。

1937年7月底，北平和天津先后沦陷。葛佩琦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和一批同学辗转前往南京，参与组建“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同学会中有中共地下党员二三十人，做了大量利于抗战的工作。

抗日游击驰骋豫东

为了奔赴抗日战场，葛佩琦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培训。1938年2月，他和战训班同学共100人抵达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委派他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到各县工作。葛佩琦和共产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40人，主动要求到接近抗战前线的商丘地区。他们的任务是根据“人不离省，枪不离乡”的原则，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拢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徐州会战。

在出发之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驻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同葛佩琦谈话，指示他到豫东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装，并表示有事时可以联系。

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堤坝，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在其他各县民运指导员纷纷撤离时，葛佩琦留在商丘坚持斗争，他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和虞城县县长蔡洪范，成立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收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遗留的枪支弹药，发起组织抗日自卫队。这支队伍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和爱国学生，编编了几支地方武装，很快发展到五六千人的规模。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游击队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几个据点，收复两座县城。

6月下旬，葛佩琦派人前往洛阳，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向刘子久转交入党申请。8月的一天晚上，葛佩琦正在洛阳出差，刘子久来到报社向他宣布：“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

葛佩琦向刘子久汇报了工作，刘子久代表党组织交给葛佩琦一个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同志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刘子久还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交给彭雪枫。

1938年10月下旬，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来到鹿邑县。葛佩琦单独和彭雪枫见面，转交了刘子久的信件，汇报了豫东地区的抗战形势。彭雪枫要他继续做好统战工作，并告知有事可以直接联系。1939年2月，彭雪枫率部进驻永城县书店店，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葛佩琦再次前往，提出想到新四军工作。彭雪枫对他说：“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留在宋克宾部，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此后，葛佩琦隐藏在国民党军队中，冒险开展抗日斗争。1940年春，他策动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所部2000余人反正。10月下旬，他又策动该军的三个师同时反正。

1942年，葛佩琦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接受赵耀斌（又名王石坚）的领导。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

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名义，携带配属电台，来到安徽界首，将悦昌恒商行作为联络据点，通过两方面的工作，搜集各种情报：派遣联络人员赴商丘、柘城、亳县等沦陷城镇，百般搜集日伪军事情报；利用国民党少将参议和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公开身份，与各路军政要员保持交往，暗中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调动信息。从此，葛佩琦在豫东、皖北成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情报网络，联络范围远至北平、上海。

1944年秋天，葛佩琦回到西安。他和赵耀斌、李年等人打着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支部的招牌，共同筹办“西安研究书店”，以此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继续开展隐蔽斗争。

深潜敌营虎穴建功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赵耀斌派葛佩琦前往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为向东北转移作准备。葛佩琦利用以前和美国空军联络站建立的关系，搭乘美军飞机到徐州，然后乘火车到达北平。葛佩琦在绒线胡同西口租到一套大四合院，以住家为掩护，建立了联络站。

1946年春节前，赵耀斌在信中用暗语对葛佩琦说，“朋友们要到东北做生意，也给你人入了股，你先留在北平，以便去东北”。大年初三，李年、王书耀、邢国彦坐飞机来到北平。这三位同志都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工作者，这次是受赵耀斌安排，准备和葛佩琦一同前往东北。

此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也到了北平。他经过李年的介绍，会见了葛佩琦，并对葛佩琦的工作能力十分赏识。几天之后，余纪忠委任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

就在葛佩琦动身去东北时，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登出一条消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令在通辽枪毙中共党员29人。这显然是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恫吓。但葛佩琦深知，东北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党组织派他到东北，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这是一个地下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就是要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打入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部门。

到沈阳后，葛佩琦和“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李年、“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耀、“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等地下党员，共同建立起一个情报小组。葛佩琦每次获得情报后，都是先传递给李年，再由李年的夫人何英芬译成电码，交由地下电台发报员发给赵耀斌。

葛佩琦在东北最初的职务是政治部代理第一组组长，能够利用身份掩护，获得大量机密。国民党在东北各支队的番号、驻地、人数、编制等信息，均汇报给长官部政治部，以便编成国民党在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这些情报，悉数经过葛佩琦之手，成功为我党所掌握。

1947年春，葛佩琦代表长官部政治部到安东（丹东）视察，向驻在该地的国民党军队参谋长了解部署情况，检查了新修的防御工事。他将这些情况，秘密报给我党地下组织。

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等地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〇”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师罢教，运动迅速席卷了60多个大中城市。6月1日，北平学生发起游行示威，沈阳学生也计划在次日游行响应。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浪潮，国民党政府采取一贯严厉镇压的措施。国民党东北行辕指定长官部政治部、

搪瓷杯记载的峥嵘岁月



祖国慰问团赠送志愿军官兵的慰问搪瓷杯。

1950年10月5日，第19兵团第63军作为第二番入朝作战部队，奉命调往山东郯县集结待命（次年2月入朝，后参加第五次战役）。在此之前，第63军驻陕西三原、耀县等

地，担负开荒建设、修建铁路及剿匪等任务。就在部队主力转进山东不久，留驻陕西的第63军留守处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创办一所搪瓷制品厂，为志愿军生产日用和医疗搪瓷器皿。留守处随即选派郎聘之、邸林杰、马儒英等12名官兵，以部队开荒生产所得的20万元为开办经费，在陕西西安筹备建厂。

场地是建厂的基础。为了尽快“安家落户”，筹建者们在西安小东门外中兴路上寻得一片面积约9000平方米的院落。这里曾开办过一家私人织布厂，因经营不善早已歇业。院内荒芜破败，甚至一些屋顶出现塌陷。考虑到距陇海铁路较近且租金便宜，郎聘之等商议决定厂址就选在这里。西北地区第一家搪瓷企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军后勤部生产科所属西安搪瓷厂，就此诞生。

拿惯了枪杆子的军人，面对搪瓷烧制却犯了难。从西安搪瓷厂建厂初期的一份组织结构表上可以看到，排在全厂各部门重要位置的技术研究室所设的设计制图员和技术检查员岗位下方，均标注“需调来”字样；

在生产管理科下设的车间记录员及其他不少重要岗位下方，也都标注着“需调来”。为解决关键的人才和设备问题，郎聘之赶赴当时中国搪瓷业最发达的上海招兵买马。经过不懈努力，不仅购买了相关设备，还想方设法请到28名自愿支援西北建设的搪瓷工人。这些技术工人到来后，很快成为西安搪瓷厂生产的中坚力量。同时，第63军留守处也从其参与的公私合营三原风利铁工厂选调了一批骨干驰援西安。这其中就有年轻的铁工厂学徒胡双印，后来他成长为西安搪瓷厂领导和该领域著名专家。

在解决了场地、厂房、设备、人才、工艺等一系列难题后，西安搪瓷厂终于在1951年下半年试制面盆成功，正式运营投产，次年注册第一个商标“白鸽”。与此同时，该厂生产的搪瓷杯、食盆、饭碗等，开始源源不断供应朝鲜前线部队。这些搪瓷用具，很快成为志愿军官兵战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由祖国慰问团带给志愿军官兵的慰问搪瓷杯，白色杯身，天蓝色滚边，

展翅的白鸽飞翔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巍峨的华表高高耸立，杯身上“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或“献给最可爱的人”等字样鲜红醒目，寄托着祖国人民对志愿军官兵的情谊和赞许，成为记载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特殊时代印记。

1952年5月，上级决定，西安搪瓷厂由军队系统移交西安市政府管理，改名地方国营西安市人民搪瓷厂（原军队人员继续留厂担任管理职务）。尽管隶属关系有所变化，但该厂军民共建、保障军需的初衷始终未变。1953年，全厂工业产值达到107万元，产量541吨，有效保障了志愿军各类搪瓷制品的供应。同年，该厂特制的40公分飞天饰花反口面盆被作为高规格礼品赠送给访华的朝鲜领导人。1962年，时任厂长的马儒英还赴京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战争的烽烟已经远去，小小搪瓷杯所承载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故事，将永远流传下去……（据《中国国防报》）